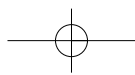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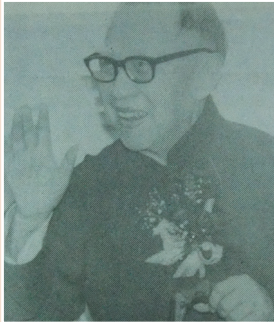
錢 穆

1895~1990

◆ 史學泰斗 ◆

王吉林／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所長





錢穆先生字賓四，江蘇無錫人，生於民國前十七年，時為清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（乙未，西元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），甲午戰敗後一年，清廷於是年割臺予日。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三十日，逝於臺北市杭州南路寓所，享年九十六歲。

賓四先生於滿清衰敗之年，西力東侵，東洋日本崛起，政治、軍事，俱受欺於強敵，中國之傳統教育，亦受到質疑。在一切待變聲中，講究船堅砲利之不足，改革政治，學習西方教育，亦成此一時代之要求。錢氏生於此一時代，所受教育，亦是由廢科舉而進學堂，接受所謂新式教育。

以今日觀之，當時之所謂新式教育，實仍新舊兼陳，重國文而輕忽其他學科。師資不足，應是一大問題。

錢氏之學校教育，因辛亥（一九一一）革命成功而終止，回鄉任初級小學教師。

在錢先生之教育生涯中，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以教為手段，以學為目的，絕不浪費光陰，更不以己為教師而滿足。其教育生涯，循序漸進，由初小而高小，再初中而高中，而師範學校，最後成為上庠名師。如非長期努力，何能有此成果。

北伐成功後，錢氏講學北大，著述、購書，為一生最愜意時期。抗戰軍興，播遷西南，雖戰火連天，而不止其傳道解惑之樂。

勝利還鄉，國共內鬥，南北不安，錢氏雖仍在大學任教，且曾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，然未再回北大。

一九四九年，錢氏由上海而廣州，轉香港。在香港辦夜間部之亞洲文商學院。次年，創辦新亞書院，以教育大陸逃亡青年為目的，延續中國文化於香江。此校之成就，為錢穆教育事業中最具理想特色之事業。

民國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）十月，來臺定居。五十八年，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華岡教授，每周一晚間七至九時，在素書樓客廳上課，自由聽講，旁聽者倍於史學所之學生。

從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五年，素書樓之講學，影響臺灣史學界甚深，而使臺灣青年，得親聆一代宗師之講學，知其治學方法與精神，中國文化之根，植於臺灣，錢氏有不可沒之功。

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，逝於臺北寓所，享年九十六歲。

壹、家世與教育

錢穆字賓四，江蘇無錫人，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（西元一八九

五年七月三十日）。錢氏歷代書香，其曾祖父繡屏公，為國學生。其祖父鞠如公，邑庠生，其父承沛公，以十六歲縣

試入泮，為第一名之秀才，三赴南京鄉試，皆在場中病倒，不終試而出。

賓四先生於七歲之時，曾赴私塾就讀，此當為傳統之舊式教育。至十歲，始入無錫蕩口鎮之果育學校。此一學校為私人所辦，分初、高兩級，各四年。賓四先生入初小一年級，其兄則入高小一年級。

賓四先生在果育學校因作文優異，獲得兩次跳級，當其兄念高小四年級時，賓四先生已念高小三年級，與其兄僅差一年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秋，與其兄聲一同考進常州府中學堂。

賓四先生入常州中學堂時，年十三。十歲入小學，初小高小各四年，錢先生肄業小學僅三年，尚未畢業即考入中學，其聰穎努力，可想而知。

在常州中學堂時，得遇經師人師之



錢先生送別侄子錢偉長(右一)留學美國時，在上海與錢偉長等人合影。

資料：(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)

屠孝寬、呂思勉二師，對錢氏之經、史研究，影響甚深。屠孝寬為中學堂監督，即今校長。屠孝寬為屠寄之哲嗣，屠寄為清末蒙古史大家，所著《蒙兀兒史記》為研究元史之不世名作，價值不在新元史之下。

另一影響錢氏之名師，為呂思勉先生。呂氏授歷史、地理兩科，年長於錢氏約十二歲。呂思勉先生後在上海任大學教授，著作宏富，所著《白話本國史》、《隋唐五代史》尤膾炙人口。錢氏與呂思勉先生論學互有異同，蓋錢氏信古文經，而呂先生則守常州派今文經之緒論。論學雖異，而師生情篤，且均讀史有成，亦可稱為教育史上之楷模。

賓四先生在常州中學堂念至四年級時，因被推為建議改革課程之代表，不獲校方同意，因而退學。以屠孝寬之介，轉學南京鍾英中學就讀五年級。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暑假，錢氏有疾，延期返校，辛亥革命成功，時局不穩，鍾英中學解散，錢氏返鄉，從此未再受學校教育，轉而從事教育事業。

貳、教育事業更上層樓

錢穆先生自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即在學校教書，開始一生的教育事業。

錢氏的教育事業，最大特點，就是



1931年錢先生於課堂上教課。
資料：(《素書樓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)

一面教學，一面自學。說是自學，實際是有很多益友，在學問方面，互相切磋，使錢氏學問，日益精進。另一方面，錢氏在教學之際，不忘研究，發表文章，漸漸有名。

民國元年，錢氏應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之聘，任初小學教師。此校為秦仲立所創，仲立好學，為始與錢氏互學之第一人。錢氏自言「余既決意應三兼小學聘，念自此升學絕望，一意自讀書。」有此一念，方能學問日進，所教學校，亦由初小而逐步上升，終成大學教授，其亦有教育意義，而可為後人師法者，略述於後。

賓四先生在三兼小學時，始讀乾嘉諸儒書，如毛大可之四書改錯一書，書中言四書朱注有許多錯誤，自是始知考據之學。

秦仲立與錢氏之共學，其中一例即秦氏讀過之書，令錢氏亦讀一遍，相互討論，秦氏讀嚴復所譯英人斯賓塞之群學肄言，令賓四先生亦讀一遍。以一十八歲之小學教師，讀乾嘉之書及西哲名著，不止在當時少見，亦令錢氏學問大進。

賓四先生在三兼小學任教僅一年，次年即來鴻模小學任教。鴻模規模較三兼完整，任教時數較三兼為少，而薪水則較三兼為多。最重要者，則在鴻模僅任高小三年級國文及史地課，由原先之每週三十六小時，減為每週二十四小時，月薪由國幣十四元增為二十元。辭三兼而去鴻模，則為錢先生之明智抉擇。

錢穆先生在鴻模期間，見北大招生廣告，言投考者須先讀章學誠之文史通義，因求此書而讀之，形於夢寐。影響更為深遠者，則為讀到夏曾佑之中國歷史教科書。因此書為北大課本，故錢氏讀之甚勤。由讀此書，錢氏始知經學有今古文之別。錢氏信古文而不信今文，當萌於此。再者，夏曾佑之書第一冊書末詳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六國年表，不增減一字。錢氏自云此後讀史，知諸表之重要，其後著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，亦受此影響。

錢氏之《先秦諸子繫年》稿，為顧

頡剛所見，大為欣賞，特推薦至燕京大學任教。錢氏之能任教上庠，當奠基於其任教鴻模小學時。

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夏，無錫創辦六所高等小學，設於梅村為第四高等小學。校長華澄波邀錢賓四兄弟前往任教。

賓四先生在第四小學任教時，每週授課十八小時，較鴻模減少四分之一，但鴻模堅不放行，故每週仍回鴻模兼課一天。小學老師，歷兩小時之船程，至曾任教之學校兼課，亦教育界之一大佳話！

錢氏至梅村縣立第四小學任教三年，讀書日進，尤受益於曾文正公之家書、家訓，遵其所言，逐篇讀書，自頭至尾，絕不跳讀。又寫日記，必記每日讀書進度，錢氏在小學教論語，因讀馬氏文通，仿其例論句法，積年成《論語文解》一書，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此為錢氏第一部著作。

錢先生在梅村鎮縣立第四高等小學任教時，讀書漸有規律，讀孫詒讓之《墨子閒詁》，始知孫氏改定墨子錯誤處，必有明確證據，而非闡解。錢先生之遊情乾嘉考據之學，自孫氏閒詁啟之。錢氏自言清人考據自經學入，錢氏則自子部入，因與乾嘉諸老異。錢氏之作《

先秦諸子繫年》，可為其自子部入之一明證。

賓四先生自民國元年開始在小學任教，自知無法升學，讀書反而更勤，同事互勉，學問反更精進，範圍亦更廣闊。錢氏自言：

回念余自民元出任鄉村教師，得交秦仲立，乃如余之嚴兄。又得友朱懷天，乃如余之弱弟。為交此二人，獲益甚深甚大。至今追思，百感交集，不能已。

錢氏所言之朱懷天，乃松江人，上海師範學校畢業，其人偏重思想方面，喜佛書及共產思想。賓四先生由朱懷天之介而愛讀六祖壇經，但不因朱懷天之故而不反共產主義思想，然無害於二人之感情。

在縣立第四小學任教時，錢氏已習靜坐，而若有成。在讀書方面，雜治理學家及道家、佛家言，尤喜天臺宗之小止觀，其書亦自朱懷天桌上得之。錢氏之深於理學，至老彌篤，當始於此。

錢先生在鴻模學校時之管事人須霖，約有六、七人，於暑假中請賓四先生為此諸人講莊子內篇七篇。經此講解，錢氏自認於莊子所未解者實尚多。後賓四先生撰《莊子纂箋》，實以講莊子而益求深解，遂有是書。由此觀之，錢氏於書未解處，不輕易放過，研究有得，

教育學

台灣教育人物誌Ⅳ

筆之於文，其著作大都如此。

參、任教中學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秋，錢先生獲廈門集美中學聘，教高中部師範部三年級畢業班之兩班國文。在集美之一年，教課負擔輕而薪水較前高數倍，因此益能讀書。船山遺書，即在集美所讀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船山一章，即用在此讀書所錄資料為依據。

先生在集美僅一年，次年即轉入無錫第三師範學校任教。錢氏之能任教三師，係由錢基博之介紹。錢基博之肯推薦賓四先生，從讀其文而知其人。在三師期間，賓四先生得識錢基博及其子鍾書。時錢基博已在上海聖約翰及光華大學任教，在三師兼課，錢鍾書時在小學肄業，聰慧異常。錢先生對錢基博推崇備至，認為係其中學任教時最值得敬事之同事，故賓四先生云：

然余在中學任教，集美無錫蘇州三處，積八年之久，同事逾百人，最敬事者，首推子泉。生平相交，治學之勤，待人之厚，亦首推子泉。

錢氏去三師一年後，錢基博即離開三師，不復再去三師兼課。

在三師期間，對賓四先生影響最大者，厥為三師對國文老師之規定，即須

自編講義，此亦督促錢氏讀書著作之一方，而不可抄他人之講義以為己用。錢氏回憶云：

三師又規定，每一國文教師，隨班遞升，於國文正課外，每年必兼開一課。第一年為文字學，第二年為論語，第三年為孟子，第四年為國學概論。子泉穎若各自編講義，余亦循例。

錢先生第一年之文字學講義，講六書大義，以篇幅未充，沒有付印，後遂失之。第二年之講義，成《論語要略》一書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第三年所編之《孟子要略》，由另一書肆出版。此二書，皆收入錢氏之《四書釋義》中。《國學概論》成書一半，後轉任蘇州中學時完稿，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前引文所提及之子泉、穎若，即錢基博、沈昌直二人。

賓四先生於錢基博外，尚推崇沈昌直。沈氏較錢鍾書年長，喜詩，尤愛東坡詩文。昌直為人謙和，以詩人而兼有儒家風，故為錢氏敬重，以為錢基博離三師後，沈昌直最為三師國文科之老師。

在三師時，賓四先生曾細讀三民主義，且以三民主義為其所著《國學概論》之殿。

錢氏任教三師時，獲交二前輩，一

為孟憲承，另一為唐文治。唐氏為賓四先生交遊中最年長者，曾為南洋大學校長（即上海交大），在無錫創國學專修館，地址在三師對面。唐氏與賓四先生所語為何，已不復記憶。其記孟憲承云：

時憲承將轉北平清華大學，任中文系主任。憲承告余，出國前，國學根柢未深。此去當一意通體細誦十三經注疏。俟閱讀此書完畢，庶對國學或可稍有所窺。余聞語深為感動。十三經注疏常在余案頭，然余迄今始終未通讀其全部。每念憲承言，心終不能釋。

讀書有得，進而從事研究，但喜讀某類書籍，方能從事某類研究。錢氏絕無意批評孟憲承，亦不指其讀十三經注疏為非，但賓四先生言迄今未通讀其全部者，蓋言其不喜經學，而喜子學，如此而已！

肆、風雲際會

賓四先生自民元在小學任教，後至集美中學，無錫第三師範學校，至民國十六年秋，轉入省立蘇州中學任教。錢氏從教小學至中學，自學不懈，又多有益友朋，互相切磋，發而為文，為有識者激嘆。及任教蘇州中學，為其進入大學任教成為學術重鎮之一的重要關鍵。

蘇州為江南古城，人文薈萃，錢氏任教於此，自非昔比。校長汪懋祖，留學美國，曾為北平師大校長，回籍為蘇州中學校長，其氣象自不同於一般人。

賓四先生在蘇州中學任教時，著作漸多，而為當代學者所重。其在無錫師範起草之《國學概論》，至蘇州中學時完稿出版，又由方壯猷之介，為商務萬有文庫寫《墨子》、《王守仁》二書。

錢先生在蘇州中學時，可能致力於其先秦諸子繫年，稿雖成而自覺有未妥處，必細加研究，覓前人之言，以證己之不虛，然有一插曲，即胡適至蘇州演講，時在東吳大學任教之陳天一東示胡氏，至蘇州莫忘一見蘇州中學之錢穆。錢氏後記此事云：

適之與余本不相識，蓋以詢典存，故典存招余同坐也。余時撰先秦諸子繫年，有兩書討論史記六國年表者，遍覓詢不得。驟遇適之，不覺即出口詢之。適之無以對。演講畢，典存留宴，余亦陪席。適之午後即欲返滬，典存告以太匆匆，何不再留一宵。適之謂，忘記帶鬚子刀，今晨已不耐，不可再留。典存謂，刮鬚子刀可購可借，區區小事，何足為困。適之言，積習非此常用刀不可。

錢氏與胡適之初次會面，即有如此不愉快經驗，宜乎以後之如冰炭。民國十六、七年，胡適已名滿天下，錢氏以

教育學

台灣教育人物誌 IV

僻書相詢，不知為不知，無害其為名學人。錢氏與胡適初次見面，即詢以僻書，且在公開場合，胡適可能認為錢氏故意刁難，自覺無趣。

對賓四先生而言，其《先秦諸子繫年》為使其能在大學任教之憑藉，始終維護錢氏在大學任教者，則為顧頡剛氏。

陳天一曾陪顧頡剛去看錢氏，顧氏見賓四先生桌上之《先秦諸子繫年》稿，因請攜返詳讀。錢氏同意，顧遂攜稿而歸。越數日，陳天一又約賓四先生至顧宅答訪，錢乃同去。顧頡剛言其匆匆翻閱繫年稿，言賓四先生不宜長在中學教國文，宜去大學教歷史。因而彼離廣州時，副校長朱家驊託其物色新人，因薦錢氏去中山大學。越數日，得廣州中山大學電，聘其前往。錢氏持電面見校長汪懋祖。汪氏言君往大學任教，乃遲早事，明年，余亦當去大學任教，因挽錢氏多留一年，可同進退。錢氏遂辭中山大學聘。

顧頡剛曾告錢氏，彼在中山，以講述康有為今文經學中心，此番去燕京大學，仍述前志。顧氏又兼編燕京學報，囑錢氏為燕京學報撰稿。

伍、講學古都

民國十九年秋，錢氏轉入北平燕京大學任教，時年三十六，已入中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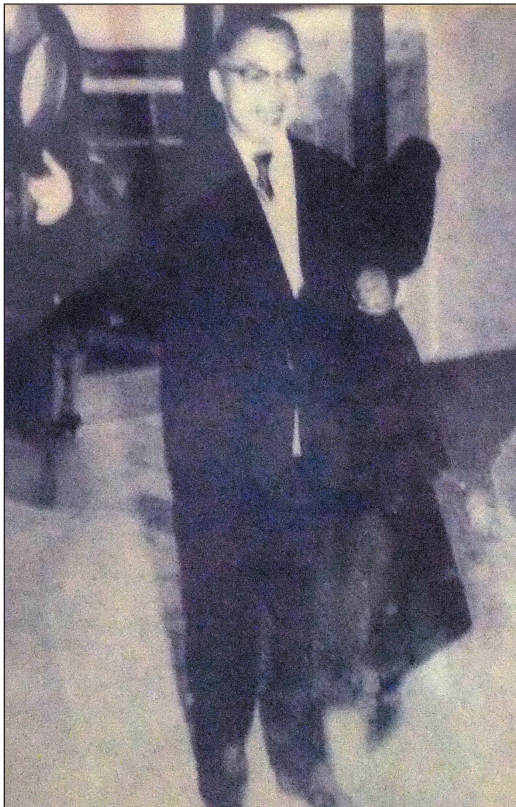
錢氏於民國十八年辭中山大學聘，次年又獲燕京大學聘，此皆由顧頡剛之推薦。世有伯樂，而後有千里馬。若無顧氏，賓四先生能否進去大學任教，甚至任教第一流高等學府，都是問題。然顧頡剛何以垂青錢氏，筆者以為顧氏在民國十五年已出版第一冊《古史辨》，以後續有出版，至民國三十年，出版七大冊《古史辨》，被推許為現代卓越的史學家。顧氏初識賓四先生時，當在民國十八年，《古史辨》第二冊所收文章，止於是年。顧氏以編《古史辨》之故，對當時古史考辨之文章，自必廣為閱讀且能第其甲乙，及見賓四先生之《先秦諸子繫年》稿，自當驚其對先秦諸子之全面考定，非探究一二人者可比。且其方法之周嚴，又非前人所能。故錢氏自云：

蓋昔人考論諸子年世，率不免於三病。各治一家，未能通貫，一也。詳其著顯，略其晦沉，二也。依據史籍，不加細勘，三也。

錢氏針對前人之三失，故詳考諸子，始於孔子生年，下逮李斯卒歲，排比聯絡，一以貫之，此非治一家者所能比。其次顯晦通考，幾無遺漏，此又非昔

人所能為。最後則詳考史記六國表之誤，還先秦史事以正確年代，諸子所處時代方可排比。錢氏於《先秦諸子繫年》之自序中，詳述此書之貢獻。《先秦諸子繫年》若無暇詳讀，但其自序當為中國讀書人所必讀。

錢氏之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，為其在小學、中學教書時研究之所得，彼亦先治一家一人，再及其他，所涉既多，遂為諸子繫年。其論前人之三病，錢氏可能亦曾經歷。《先秦諸子繫年》稿創於



1960年赴美國講學於香港機場留影。
資料：(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)

賓四先生任教無錫師範時，為民國十二年秋，及顧頡剛見此稿，已在六年之後，時為民國十八年秋。此書寫成經過，錢氏在《先秦諸子繫年》跋中已有詳述，此處不再徵引。

前文言及孟憲承氏欲通體細誦十三經注疏，錢氏自言其至今未能全讀，是知錢氏不喜經學，而鍾情諸子。關於此點，錢氏自言：

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，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學。及余在大學任教，專談學術，幾乎絕無書院之精神。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。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。

錢氏之喜理學，疑今文經學派之說，可能早在其為常州府中學堂之學生時，彼時方一十幾歲之童子，然其思辨已若老儒。錢氏曾為經今古文學之問題，與其中學老師呂思勉有所論辨，後追憶云：

惟憶誠之師謹守其鄉前輩常州派今文學家之緒論，而余則多方加以質疑問難。誠之師最後一書，臨了謂君學可比朱子，余則如象山，儘可有此異同。余不知此係誠之師之謙辭，抑更別有所指。惜後再見面，未將此問題細問，今亦終不悟當時誠之師此語是何意義也。

在基本上，清末民初今文經學派盛行，可能與其時之政治有關，希望改革

教育學

台灣教育人物誌 IV

，而錢氏反今文經學者，而不認同古文經出於漢儒偽造。再則錢氏不喜乾嘉考據，而好宋明理學家言。

錢氏不喜乾嘉考據，以更精進之方法，遍考先秦諸子而成繫年一書，可謂超出乾嘉考據之上的大著作，代表錢氏三十六歲以前的成績。

陸、平息今古文經之爭

錢先生之教育生涯，約可分為三個階段。

從民國元年至十一秋，為在小學教書之時，約十餘年。民國十一年秋，至十九年秋，前後八年，任教中學。自十九年秋，始在大學任教，以迄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告別杏壇，在大學任教逾五十餘年，至為難得。

錢先生去燕京大學之前，同年在燕京學報發表其〈劉向歆父子年譜〉一文。此非為劉向歆父子二人撰年譜，而實為證明劉向歆及王莽未嘗偽造古文經。清末康有為著《新學偽經考》，而謂古文經皆出諸王莽之新朝所偽造，而為王莽篡位立說。

有關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，其弟子新會梁啟超嘗略述云：

偽經者，謂周禮、逸禮、左傳及詩之毛傳，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立博士者。新學者

，謂新莽之學。時清儒誦法許、鄭者，自號曰漢學。有為以為此新代之學，非漢代之學，故更其名焉。新學偽經考之要點：一、西漢經學，並無所謂古文者。凡古文皆劉歆所偽作。二、秦焚書，並未厄及六經，漢十四博士所傳，皆孔門足本，並無殘缺。三、孔子時所用字，即秦漢間篆字，即以文而論，亦絕無古今文目。四、劉歆欲彌縫其作偽之跡，故校中秘書時，於一切古書多所羈雜。五、劉歆所以作偽經之故，因欲佐莽篡漢，先謀湮滅孔子之微言大義。（清代學術概論頁66~67）

康氏之《新學偽經考》，雖其弟子亦病其武斷。梁啟超云：

有為弟子有陳千秋、梁啟超者，並夙治考證學，陳尤精洽，聞有為說，則盡棄其學而學焉。偽經考之著，二人者多所參與，亦時時病其師之武斷，然卒莫能奪也。（清代學術概論頁67）

然在當時，今文經學為學術之重鎮，其大師則為廖平與康有為二人。康有為受廖平影響，為一不爭之事實。廖平之說，與康有為略有不同。康指古文經全為劉歆所偽造，廖則認為今文學家其家法可追至兩漢以前，此康廖之所異也。錢氏總序其兩人之失曰：

清季今文學大師凡兩人，曰廖季平與康有為。康著新學偽經考，專主劉歆偽造古文

經之說，而廖季平之今古學考，剔絕益細，謂前漢今文經學十四博士，家法相傳，道一風同，其與古文對立，則一一追溯之於戰國先秦，遂若漢代經學之今古文分野，已遠起於先秦戰國間，而夷考漢博士家法。事實後起，遲在宣帝之世。及其枝分脈散，漫失統紀，歧途亡羊，無所歸宿。不僅無當於先秦之家言，抑且復異於景、武之先師。兩漢書儒林傳可資證明。

廖平之為人，不若康氏之堅持與武斷。廖平為王闓運弟子，闓運以公羊學聞於時，所著公羊箋，梁啟超以為不逮孔廣森，梁氏言廖平云：

平受其學，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，頗知守今文家法；晚年受張之洞賄逼，復著書自駁，其人固不足道，然有為思想，受其影響，不可誣也。

梁啟超以廖平「其人固不足道」評之，當責其未能守今文學家法而言。廖平之學，晚年確有改變，賓四先生任教無錫師範，曾在學校週會講先秦諸家論禮與法，講辭刊於無錫師範校刊，川人蔣錫昌在重慶任教，得此校刊，以示其同事蒙文通。錢氏追記其事云：

文通川人，其師廖平季平，乃當時蜀中大師。康有為聞其緒論，乃主今文經學。而季平則屢自變其說。文通見余講辭，乃謂頗與其師最近持義可相通。遂手寫一長札，工

楷，盈萬字，郵寄余。及余在蘇中，文通已至南京，在支那內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。（師友雜憶頁126）

後蒙文通至蘇州訪錢氏，同遊甚歡，讚錢氏《先秦諸子繫年》稿體大思精，可與顧炎武諸老輩中求其比，乾嘉以來，少其匹矣。

可能因廖平不再堅持其說，而蒙文通又言其師最近持義可與錢氏相通，故對廖氏，賓四先生言辭甚為平和。

賓四先生最不滿於康南海者，為其誣古文經皆出於劉歆偽造，而不追溯古文經之源流，以及其文之不同。錢氏著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者，即將康有為之武斷，徹底解決，還古文經以應有之源流。

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發表後對學術界究有何影響，錢氏在素書樓講課時曾云：「此後再無人爭辯今經古文問題，此一問題於焉解決。」錢氏晚年追憶此一經過云：

余撰劉向歆父子年譜，及去燕大，知故都各大學都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，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。余文出，各校經學課多在秋後停開。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。

錢氏並非主古文家言，乃還經學以歷史真象，不可厚誣古人，以馳己說。

教育學

台灣教育人物誌 IV

柒、講學於戰亂之中

自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秋，錢賓四先生得顧頡剛之介，北上任教燕京，次年，轉入北京大學。

自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六年錢氏任教北大，多識古都之俊彥。時上海為商業都市，南京為國都，乃政治都市，唯北京為舊都，乃文化都市。彼時大學教授之待遇甚佳，錢氏在此七年之間，得交當時之知名學者，又能旅遊，可能為一生中較為得意之歲月。

抗戰軍興，國府遷往重慶，北京各大學亦因而南遷，錢氏亦隨北大南遷。抗戰八年，錢氏先在西南聯大任教，後轉至在成都之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，此亦為顧頡剛所挽，顧氏任國學研究所主任，其經費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之支持，待遇可能優於戰時之國立大學。

錢氏任教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時，



1933年錢先生與新亞書院第四屆部份畢業生合照。
資料：（《錢賓四先生與我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）



1950年，錢先生(左)和唐君毅(右)等在香港創立新亞書院。
資料：(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)

獲一高足，即桐城嚴耕望，後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專事研究，以治中國中古制度史名於世，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抗戰勝利後，錢氏曾任蘇州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。後因內戰，錢氏於民國三十八年由上海而廣州，由廣州轉至香港。初至香港，辦一亞洲文商學院，借中學教室三間，夜間上課。

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秋，錢氏離亞洲文商夜校，與友人同創新亞書院。

新亞書院之創辦，多為大陸逃港之學者，其目的亦在教育逃至香港之青年。在思想方面，以研究中國文化為主。名為書院者，錢氏醉心於宋代書院，思辦一小而美的高等學府，傳中國文化於香港，影響於世界。

新亞書院之經費，先得臺灣之支助，其學籍亦得臺灣之承認。後又得美國耶魯學社之撥款援助，故經濟無虞。

民國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新亞研究所成立，使新亞書院畢業生，有深造機會。新亞所培養之人才，遍及港、臺及美國，其中如余英時、陳啟雲、遂耀東等人，皆為史學界之知名學者，其他為余所不知者，又不知凡幾。

後新亞書院與聯合、崇基合併成為中文大學，此為錢氏在教育上之有形貢獻。

民國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）十月，錢穆先生偕夫人胡美琦女士來臺定居。來台之初，集中精神在《宋子新學案》之寫定。《宋子新學案》成，又撰《朱子學提綱》以為導讀。

《宋子新學案》完稿後，錢氏於民國五十八年應中國文化大學（早日之中國文化學院）創辦人張曉峯之聘，任華岡教授，在史學研究所授課，每週兩小時。

賓四先生在臺演講多次，遍及南北大學及軍政黨團，然在大學正式授課，則僅文大而已。

錢氏在文大授課，每週兩小時，排在晚上七至九點。選課者皆為文大史學所學生，然他校學生及社會青年聞風而至旁聽者，倍於文大研究生，猶憶錢氏開課之初，筆者為文大博二學生。選錢先生之課，每週一晚趕至素書樓門前，

候至七時，開門而登臺階，至素書樓客廳，圍繞在一圓桌旁，聽錢先生講課。當時只覺錢氏精神甚好，滔滔不絕，源源本本，講說甚為清楚，偶而批評胡適，亦不覺過分，因憶臺大方東美教授，亦喜在課堂上月旦適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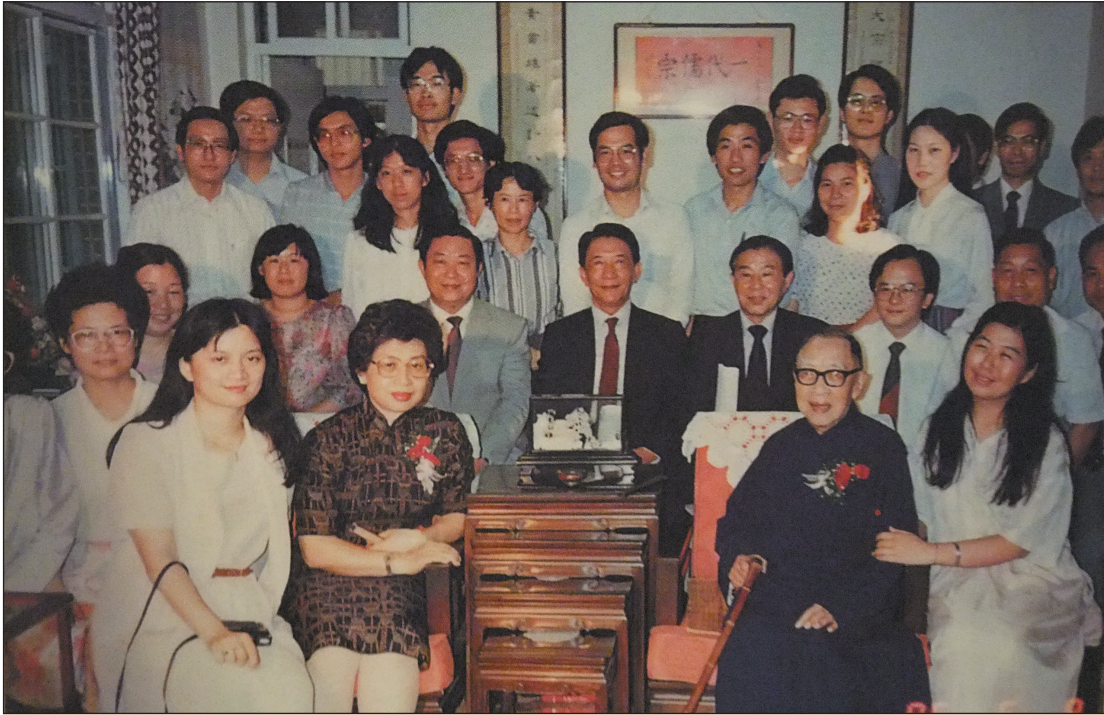
賓四先生在文大之講學，從民國五十八年起，至七十五年（一九八六）而止，前後十七年，錢氏所講內容，均錄音整理，錢氏親自審定後出版為書，流傳甚廣，嘉惠士林，其中《中國史學名著》最為學界所推崇。

文大史研所之授課外，錢氏又得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復璉之邀，以特聘名義為研究員，為之特闢一研究室，得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三朝理學諸集，得有撰述。在日常生活費用方面，頗賴曉峯及慰堂之安排，而獲解決。



1989年10月10日錢先生於中大新亞書院四十週年校慶日。

資料：（《錢賓四先生與我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）



1986年錢穆於素書樓的最後一堂課與學生的合影。資料：(《素書樓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)

此時，師母胡美琦教授，亦在文化史學系講授中國教育史，而賓四先生在素書樓之生活，講學、著述以外，似無其他干擾，而師母之照顧，亦無微不至。猶憶筆者在素書樓聽課時，師母必在座，除照顧錢師外，亦如學生般盡心聽講。

錢氏之講學，至民國七十五年（一九八六）六月九日而止，蔣經國總統聘為總統府資政。二十日，行政院院長俞國華設宴款待，贈予「鴻儒碩望」之鏡屏。

民國七十九年（一九九〇）五月，



錢穆伉儷攝於新亞書院賓館。

資料：(《錢賓四先生與我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)

遷出素書樓，居於杭州南路之公寓。至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去世，享年九十六歲。一代不世出儒宗，嗚然而逝，高山景行，何所仰止！

錢氏從民元任教，至七十五年告別杏壇，著述之多，及從事教育時間之久，影響之大，恐世無其人，而亦難有來者！



1978年錢先生返港主持『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』並與前辛亞書院校長金耀基教授與董事長陶學祁先生合照。資料：（《錢賓四先生與我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）



1969-1986年錢先生在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授課，並利用素書樓的客廳作為講學場所，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眾多。資料：（《素書樓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）

教育學

台灣教育人物誌 IV



九十五歲時的錢穆先生攝於素書樓客廳。
資料：(攝於《錢賓四先生與我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)

二〇〇五)十月初版

鄧爾麟 《錢穆與七房橋世界》藍樺譯
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二版

印永清 《百年家族—錢穆》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二〇〇二年十月初版

梁啟超 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里仁書局

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初版二刷

錢 穆 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

一九九七年八月 北京商務印書

參考書目

錢 穆 《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本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，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再版。

王吉林 〈錢穆先生的思想〉《二十世紀前半葉人文社會學術研討會》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東吳大學

王吉林 〈論錢穆與梁啟超「意見相異」之處〉《錢穆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東吳大學錢穆故居管理處編印，民國九十四年（